

「明」梅国桢 著 凌礼潮 笺校

梅国桢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明〕梅国桢 著 凌礼潮 笺校

梅国桢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国桢集/[明]梅国桢著;凌礼潮笺校.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0

ISBN 7-216-04874-1

I. 梅…

II. ①梅…②凌…

III. ①奏议—中国—明代—选集

②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明代

③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①K248.065②I21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9575 号

梅国桢集

[明]梅国桢 著
凌礼潮 笺校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125

字数:290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16-04874-1/K·518

定价:2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会长

張建業

凌礼潮同志历时三年，终于将他早就屡屡跟我谈起的《梅国桢集》作了最后的定稿，将要付梓了！

《梅国桢集》的出版，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抢救和保存了一部濒于消亡的宝贵史料。梅国桢是明朝中后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但有关他的文集一直未能整理出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事迹将很快荡然无存。即使是现在，搜集他的诗文，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这部书稿的价值，对于研究明代学术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凌礼潮同志虽然在党政部门就职，但工作之余，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学术中去，为濒于消亡的古籍资料抢救和整理不憚辛劳。其意义，退一万步讲，对于研究麻城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来说，也是不可低估的。据他讲，《梅氏族谱》中保存最好的，当数梅之焕的作品。梅之焕生活在明王朝正在崩溃、清王朝即将建立之际，那个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时代，想必在他的诗文集有着更为丰富而全面的记载。凌礼潮同志正在对梅之焕的作品进行整理，我们期待着《梅之焕集》的接踵出现。

其二，为李贽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增加了难得的史料。李贽在麻城（包括黄安）生活了将近 20 年，梅国桢是李贽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李贽的思想对梅国桢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迄今为止，学界对梅国桢的了解，尤其是有关梅国桢对李贽思想影响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而这个影响，是绝对存在的。凌礼潮同志在《前言》中谈到李贽所著《孙子参同》一书当有梅国桢军事思想的影响在，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例。

其三，为李贽悲剧的成因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正如凌礼潮同志所言，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梅澹然遭谤而死，是受了李贽的牵连。也就是说，梅澹然是“李贽事件”的牺牲品。这种看法，恐怕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凌礼潮同志对此提出了新的看法，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了“在李贽和梅澹然遭谤的初期，主要的诽谤对象是梅澹然而不是李贽。但是，这种诽谤最终被统治阶级和理学卫道士们所利用，成为迫害李贽的主要罪名之一”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潜台词说白了，就是“李贽遭谤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最初起因），是受到梅家（或者说是梅澹然）的连累”。当然，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其四，为《金瓶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马泰来先生关于《金瓶梅》与麻城刘家、梅家关系的研究是大家熟知的。凌礼潮同志从梅家与刘家的姻亲关系入手，证明了梅国桢与刘承禧的翁婿关系，并据此提出了《金瓶梅》最初版本流传的新途径。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史料，我们都

可以在本书附录的《梅国桢年谱》中找到。实际上，凌礼潮同志对《金瓶梅》作者和西门庆原型问题也有新的看法，并正在致力于有关证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我们期待着他能尽快取得成果。

由于有这四个方面的意义，故当凌礼潮同志要求我为此书作序时，我只能欣然同意。

是为序。

2006年8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前 言

梅国桢是一个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淹埋了的人物。即使是在他的家乡麻城市，甚至于在麻城梅氏后裔中，你提起梅国桢这个名字，回答你的保证都是一脸的茫然。相反，倒是他的侄子梅之焕，在麻城妇孺皆知，有关传说历久不衰。其中的原因，大约与梅之焕居乡时间长达十余年，而梅国桢丁忧归里、服阙即亡有关。实际上，比起梅之焕来，梅国桢的一生更富传奇性。

梅国桢，字克生，又作客生，号衡湘。麻城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享年64岁。梅国桢的科举之路颇不顺利，自隆庆元年（1567）以第55名的成绩中举后，一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才进士及第。六上公车，久困场屋，中进士时已42岁。

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五年，梅国桢任顺天府固安县令。以政最，擢河南道试御史。万历十九年，以母忧服除，起为浙江道御史。万历二十年二月，西北边境发生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叛乱，鞑靼河套部也蠢蠢欲动。梅国桢挺身而出，力排和议，独荐李成梁父子领兵平叛，并自请以身监军，疏四上始准。在宁夏，梅国桢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与将士同甘共苦。经过五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梅国桢以功升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八月，擢都察

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成为开府云中的大中丞。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梅国桢升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兼理钱粮。官居三品，达到了他仕途的巅峰。从万历二十八年开始，厄运接连降临。首先是女儿梅澹然因学佛而死，好友李贽被逐出麻城。紧接着是父亲亡故，归里守制。万历三十年，好友李贽更被迫害致死。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梅国桢身心疲惫，引发了宁夏平叛时餐风宿露落下的劳疾，终于一病不起。万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梅国桢逝于麻城。

梅家是麻城望族，与刘、李、周氏并称麻城四大巨族。梅国桢的祖父梅吉对他的影响很大。据《梅氏族谱》记载，梅吉字仲修，号西野。中弘治己未（1499）进士，选任南京车驾司郎中，外转广东惠州府知府。到任才8个月，就因替府学生员鸣不平并为之白冤而得罪了上司。于是桂冠归里，不再作官，归家时“囊只俸金八两”。梅吉生来身材高大，为人端重，性直憨而善谈论。有子五人，但无一人取得功名，孙子辈中也不见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刘氏家族已出了8名进士，李氏和周氏家族也是接连金榜题名。于是，梅吉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孙子梅国桢身上。梅国桢的父亲梅汝观，是梅吉的第五个儿子，母亲是进士陈三泉的女儿。梅国桢出生时，梅吉已81岁，老太爷自然视若掌上明珠，悉心培养。梅国桢早慧，4岁即能对句，“客有以‘桂花香十里’试公者，公应声

曰：‘梅子发千枝。’试者奇之。”（《梅氏族谱》卷首庄天合撰《梅公墓志铭》）这事虽然让人觉得有些夸张，但比一般的孩子聪明是可以肯定的。国桢8岁那年，祖父梅吉去世。国桢的童年，在为人正直而又学识渊博的祖父的呵护下，健康而又快乐地成长。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渴望，也深深地刻入了他幼小的心灵。

第二个始终影响着他的宦途走向和人生理想的人，就是刘天和。

刘天和（1479—1545），字养和，号松石。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累迁右副都御史，后以故官总理河道。嘉靖十五年（1536），为加强边备，升刘天和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嘉靖十七年（1538）八月，鞑靼吉囊部扰河西，刘天和却之，升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仍任三边总制。嘉靖十九年（1540），寇将入平虏城，天和伏兵花马池。寇战不胜，走河上，遇伏兵，多死于水。吉囊乘虚寇固原，剽掠且饘。而诸将多畏缩，天和斩指挥二人，召故总兵周尚文令立功。会陕西总兵官魏时角寇至黑水苑，尚文尽锐夹击，杀吉囊子小十王。寇退宁夏，巡抚杨守礼、总兵官任杰等复邀击，败之铁柱泉，斩获共440余级。论功，加天和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为世爵，前后赏赏银币十数。后迁南京户部尚书。嘉靖二十年（1541）俺答派使者至大同，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保证以后“令边民垦田寨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明朝廷认为其请贡不可信，予以回绝。又诛戮使者，传首九边。俺答大怒。次年六月，俺答部以10万骑扰山西，掠10卫38州县，杀戮男女20余万，抢掠金钱财

宝无算，焚毁公私庐舍8万户，蹂躏田禾10万顷。七月方出塞而归。嘉靖帝又改天和为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嘉靖二十二年(1543)，言官论天和衰老，遂乞休归。家居三年卒。赠少保，谥庄襄。

刘天和在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功绩，一是治河，二是御边。在担任河道总理期间，“黄河南徙，历济、徐皆旁溢。天和疏汴河，自朱仙镇至沛飞云桥，杀其下流。疏山东七十二泉，自鳧、尼诸山达南旺河，浚其下流。役夫二万，不三月讫工。”(《明史》卷200)尤其是他推行的“植柳六法”的护堤措施，更为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所学习和继承。可以说，在明代治河史上，刘天和的影响仅次于潘季驯。出任三边总制后，刘天和注重改进武器装备，以原用“兵车皆双轮，用二十人，遇险即困，又行迟不适于用”，乃改为单轮车，“上置炮枪斧戟，厢前树军狻猊牌，左右虎盾，连二车可蔽三四十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战则护骑士其中，敌远则施火炮，稍近发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敌走则骑兵追。复制随车小帐，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边墙濠堑。”(《明史》卷200)这一系列措施，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军威大振，屡败鞑靼兵。

刘家与梅家数代姻亲不绝。尽管刘天和死时梅国桢才4岁，但那些传奇性的战斗故事和令人神往的边塞风光，自然会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丈夫重勋业，壮士薄雕虫！近闻关塞外，和议渐不终。”(卷4《赠李华君实子光远元晖》)“便须南取倭、北击虏，功成不受印如斗。”(卷4《匕首篇》)在他为数不多的诗中，充斥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渴望。万历十六年九月，青海部长他不囊犯西宁，杀副将李魁，边境

骚动。正居家服母丧的梅国桢，一直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寻找着奔赴疆场，“系单于之颈”（李贽《焚书》卷2《与梅衡湘》），杀敌立功的机会。

万历二十年，年过半百的监察御史梅国桢，终于抓住了宁夏平叛的机遇，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夙愿。我们看他的《征哱奏议·第一疏》：“为今之计，非力剿无以定祸乱，非分别无以宥无辜，非诏赦无以安胁从，非特遣无以重事权，非破格无以用豪杰，非便宜无以中事机，非重赏无以作士气。”力主出兵剿平祸乱。所谓“特遣”，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的请缨自荐埋下伏笔。果然，《第二疏》就挺身而出：“臣自外吏入厕台班，虽怀狗马之心，未效涓埃之报。若疑徒市私恩，不顾国计，愿与成梁驰赴宁夏，同心讨贼。不必加以别衔，假之重任，但凭陛下威灵，生平忠义。贼知归命，则臣为陛下之使，奉扬恩赦以安反侧；负固不服，则臣为陛下之将，披坚执锐为士卒先。”但梅国桢并非一介莽夫，他对边事有着深切的了解。他说：“我朝边事，自洪武以至嘉靖，一时也。自隆庆以至万历十八年，一时也。自十八年以至今日，又一时也。盖洪武以至嘉靖，寇无岁不犯，我无岁不备。各军虽有战守之劳，无克削之苦。嘉靖以至隆庆，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有克削之苦，而无操练之劳。今时则异是矣，外实修和而内欲兼战。修和则不免仍克削以为媚寇之资，兼战则徒有操练而无首功之望。”（《第一疏》）这个分析，既高屋建瓴，又切中要害。对于敌情，他认为，“其心必不肯悔祸，其党又无敢先发。迁延一日，则祸深一日；狂谋愈成，党与愈固；声势愈大，风闻愈远；胁从愈多，人心愈疑。既难以俟其自定，又

不可吓以虚声。外有勾连，内有观望；近者蚕食，远者震惊，将来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同上）一旦皇上同意他以御史监军后，他似乎忘记了先前所说“不必加以别衔，假之重任”的话，立即向神宗提出五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请皇帝“假以威令”，赐给他可以“诛将士之不用命者”的尚方宝剑；第二条竟要求自己不仅仅“监军”，还可指挥作战；第三条则是索取人事权，等等（《第四疏》）。总之，读他的《征倭奏议》，我们除了感受到他那迫不及待的立功报国之心以外，还不能不佩服他对边事的洞察和对军事的留心。

终于，梅国桢成功了，他凭借自己的才华，经过艰辛的努力，实现了他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政治抱负。可以断言，如果梅国桢不是过早地离开人世，按照明朝的惯例，继续升迁是不成问题的。

二

梅国桢与李贽的交往，是一个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的问题。

李贽一生，以求友为乐，汲汲于寻觅胜己之友，以至于“终日欲见胜己之心，终年有不见知己之恨”。但是，在他那些最亲近的朋友之中，却很难找到几个真正能与他始终不渝的人。耿定理因早逝姑且不论，那些被李贽视为“相爱”但并非“相知”的杨定见、刘近城、无念、丘长孺之辈也姑且不论，其他如周思久、周思敬、焦竑等李贽视为胜己之友者，当耿定向与李贽的论战开始后，或与李贽关系破裂，或首鼠两端、依

违两可，或干脆疏远回避、音耗阙然。直至李贽生命的尽头，我们所能看到自始至终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的，除了一个马经伦外，就只有一个梅国桢了。

梅国桢与李贽的初次见面在万历十六年春二月^①，在梅家位于城北龙池边的环阳楼上，李贽写了《环阳楼晚眺得棋字》一诗。就在这以后，梅国桢之女梅澹然认识了李贽，并因李贽的影响而落发出家。李贽在谈到他和澹然的交往时说：

彼知我不肯为人师也，然已时时遣人走三十里问法。予虽欲不答，得乎？彼以师礼默默事我，我纵不受半个徒弟于世间，亦难以不答其请。故凡答彼请教之书，彼以师称我，我亦以澹然师答其称，终不欲犯此不为人师之戒也。呜呼！不相见而相师，不得师而彼此皆以师称，亦异矣^②！

万历二十一年(1593)，李贽将他和梅澹然等人的来往书信结集为《观音问》刻印成书，公布于世，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封建士大夫、理学家们群起而攻之，甚至勾结官府，对李贽进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梅国桢不仅没有因事涉女儿名节而回避，反将李贽接往大同，“供养甚备”^③，还为其抄录《藏书》并作序。他在序言中说：“自古豪杰之士，其识趣论

① 依林海权先生说，见《李贽年谱考略》2005年修订版，福建人民出版社。

② 《焚书》卷4《豫约》。

③ 《续焚书》卷1《答李惟清》。

议，与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艰难危急之时用焉，当治平无事，往往无以自见。其磊块不平之气，不得已而笔之于书。书又不相入，而藏之名山以俟千百世之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犹今之人乎？豪杰之士，不宜于人也如此……余不及秃翁远甚，而与世不相入则甚似之。”这些话，既评李贽又兼自况；既是他们人生遭际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友情不渝的思想基础。李贽至云中，特地带去了他的《孙子参同》书稿，除了请梅国桢为其作序以外，可以推想，更重要者，当是有所就教于梅国桢。就如梅国桢在《孙子参同叙》中所说：“云中于兵，犹齐鲁之于文学，其天性也。”对于李贽来说，梅国桢自然更加精通《孙子兵法》。李贽对梅国桢的评价是很高的，称之为“伯乐之千里马，王武子之八百骏”。^①针对有人攻击梅国桢“专任权智”、“大样”（麻城方言，高傲，看不起人的样子）的言论，李贽辩解道：“余谓衡湘虽大样，然心实细谨，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誉衡湘也哉？……然千里之驹，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凤乎，虽至奇且异，亦奚以异为也？士之任重致远者，大率类此。而世无伯乐，祇谓之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真可慨也！”（同前引）在《与友人》的信中，李贽将梅国桢与顾养谦作了比较和评价：

顾冲庵具大有为之才，负大有为之气，而时时见大有为之相，所谓才足以有为，而志亦欲以有为者也。梅衡湘亦具大有为之才，而平时全不见有作为之意，所谓无为而

①《续焚书》卷4《八物》。

自能有为者也。此二公之别也，然皆当今之杰也，未易多见者也。顾冲庵气欲盖人，而心实能下人。梅衡湘时时降下于人，而心实看不见人。此又二公之别也，然亦当今之杰也，未易多见也。在宁夏时，以不干己之事而能出力以成大功，其有为也如此；今居大同，军民夷虏若不见有巡抚在其地者，其安静不为也又如此，所谓真人杰者非耶？^①

在写给陶望龄的信中，李贽又将梅国桢与马经伦等三人作了比较，他说：“梅客生虽眼前造诣胜是三公，但负其奇迈，少许可，亦终为经世士耳。”^②

万历二十五年，李贽在山西动身前往大同之前，应刘东星的女婿王洽之请，为其作《寿王母田淑人九十序》^③一文，不到700字的篇幅，就有近500字是在谈论梅国桢；至大同途中，写了《晋阳怀古》^④一诗，对梅国桢在平定宁夏兵变中首建奇功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国桢的同情。到桑乾河边，李贽已经按捺不住尽快见到梅国桢的急切而又激动的心情：“逢人勿问我何方，信宿并州即我乡。明日桑间横渡去，两程又见梅衡湘。”^⑤欢快和期待，跃然纸上。

在大同，李贽的心情是轻松而又愉快的。“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笑时倾城倾国，愁时倚树凭阑。尔但一开两朵，我来万水千山。”^⑥在

①《续焚书》卷1。

②《续焚书》卷1，《复陶石簪》。

③《续焚书》卷2。

④《焚书》卷6。

⑤《焚书》卷6，《渡桑间》。

⑥《焚书》卷6，《云中僧舍芍药》。

他为数极少的诗作中,这种明快的风格确实是罕见的。在《乾楼晚眺》^①中,“凭高一洒衣,望远此何时?正是中元节,兼听游女悲。杯干旋可酌,曲罢更题诗。愿将北流水,弹与钟子期。”(其二)“中丞綏定后,携我共登临。所喜闻谣俗,非干怀壮心。山云低薄暮,楼日压重阴。欲归犹未可,此地有知音。”(其三)尽情地表达了他与梅国桢非同寻常的友谊。

万历三十年三月,李贽在北京被迫害致死时,梅国桢正在麻城丁忧守制。得到李贽自杀的噩耗,梅国桢愤激之余,满怀深情和对世态的不平写下了《恭荐李长者疏》一文^②。他说道:

持己太高,故当意者少;望人过重,致负心者多。泾渭分明,乏藏垢纳污之量;斗山卓绝,怀调高和寡之悲。刚方未免激昂,真实间成执着。善善恶恶,务必极其本怀;是是非非,略不徇诸时好。以致招嫌触忌,遂而贾怨益仇。

对李贽孤傲叛逆性格特点的评述,揭示了李贽悲剧结局的必然性。文章的结尾处,对迫害李贽的恶势力,梅国桢表示了极端的轻蔑和愤怒:“太虚无物,任他把火烧空;群小流言,何异弯弓射影!”这种大无畏的豪情,与李贽敢“与百万人作对敌”^③的精神毫无二致。

①《焚书》卷6。

②康熙《麻城县志》卷9,该文置于梅之焕文中,然据其文有“试忆丁亥后种种悲欢得丧”句,丁亥为万历十五年,其时梅之焕才13岁,故此文当为梅国桢所作,见拙著《麻城梅国桢大传》(湖北音像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③《续焚书》卷1,《与焦弱侯》。

关于李贽与梅澹然遭到攻击和迫害的原因,也是一个应该重新探讨的问题。

李贽寓居麻城以后,封建士大夫阶层和理学卫道者们在对李贽的攻击和迫害中,无一例外地都罗列了他“勾引士人妻女”、“僧尼宣淫”等罪名^①。历代学者虽然不乏从李贽的人品和性格上对这些罪名予以驳斥之论^②,但认为梅澹然遭谤而死,实在是受了李贽的牵连。也就是说,梅澹然是“李贽事件”的牺牲品,这种看法,恐怕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人的共识。

持这种认识并不奇怪,因为李贽是名人,梅澹然不过是一普通女子。李贽的“异端”思想,极大地危害和动摇了统治阶级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既是他必然受到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封建理学卫道者们必欲将他去之而后快的目的。梅澹然与李贽交往只不过是迫害李贽的诸多罪名中的一项而已。

对这种看法最先提出异议的,是李贽的好友,曾任御史的马经纶。他在李贽被湖广按察司僉事冯应京逐出麻城后写给冯应京的信中说道:“且‘宣淫’之说,意在梅氏绣佛寺

①耿定向写信给周思久说:“鲁桥诸公之会宴邓令君也,卓吾将优旦调弄,此亦禅机也,打滚意也。”又说:“卓吾曾强其弟狎妓,此亦禅机也。”又说:“卓吾曾率众僧入一嫖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士绅多憾之,此亦禅机也。”(李贽《焚书》增补一《答周柳塘》)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说:“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明神宗实录》卷369)谈迁说:李贽“寄居麻城,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作《观音问》。”(《国榷》卷79)

②最典型如沈德符说:“忌者遂以帏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铁,不足污也。”《万历野获编》卷27“二大教主”。